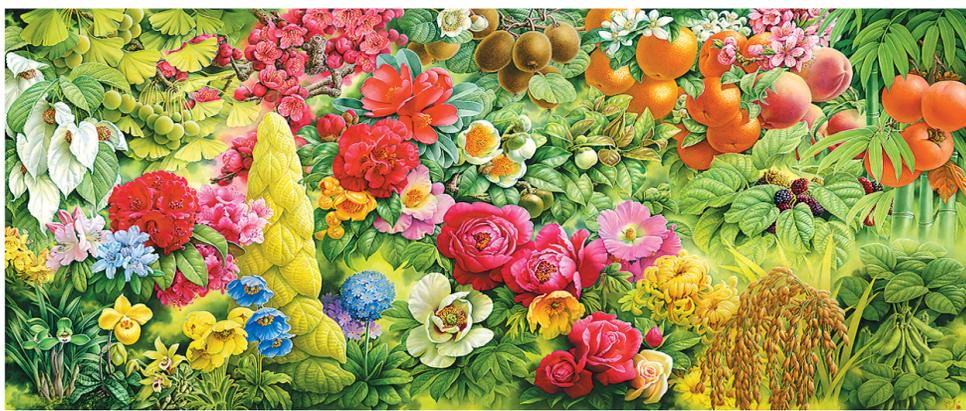


读《自然而然：曾孝谦自传》，感受最深的是朴实、低调的文字，写出了传主勤奋、精益求精的一生，其中蕴含着曾孝谦老先生以“一生一世”之心绘自然的情怀。

这些年，随着作品渐渐进入大众视野，曾孝谦的事业和成就，或多或少被人们所了解，而读这本自传，更能使我们详尽地看到其求学、成长到成为一名植物科学绘画师的人生历程。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纸本、丙烯颜料）

曾孝谦作

曾孝谦的职业生涯，是伴随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开始的。他自幼爱画画，1959年高中毕业时因故没能上大学，不过却意外被招进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分类室的绘图组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开始接触植物插图。他与同一批入职的同事从植物学基本知识学起，了解科属、辨识植物，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植物科学绘画在摸索中发展的过程。

植物科学绘画是植物学的辅助，是个不太被外人了解的行当。中国生物科学绘画奠基人冯澄如老先生，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现代植物学家胡先骕、陈焕镛等人的著作绘制过精准的生物插图。抗战期间，他创办江南美术专科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生物科学的中坚力量。曾孝谦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后，常常通过冯澄如的《生物绘图法》学习和传承前辈、同行的技法。

彼时条件有限，绝大部分物种只能依靠腊叶标本去复原它们在自然中的形态。干标本放在加了水的烧杯里，用酒精灯煮，煮到恰到好处变软之后，再小心地放在解剖镜的载玻片上，观察植物花朵的形状和构造，包括花冠、花萼、雄蕊和雌蕊，尤其是花丝、花药、子房、柱头的形态。接着再剖开子房，仔细记录内部胚珠和胎座的结构，把这些一一画出来，并请专家确认。腊叶标本经过脱水、压扁，与植株原本的形态有所差别，绘图员需要将它们的自然姿态活灵活现地还原出来，非常考验技术。

曾孝谦还有一脉师承，那就是经典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这个创办于1787年的杂志，兼具研究性和科普性，以版画形式将科学和艺术融合在一起。他从临摹经典的博物画起步，学习西方传统而精湛的绘图技巧，逐渐探索自己的风格。曾孝谦引入光感、冷暖和明暗对比，融合中国画的白描，有时同一幅图上白描和版画的特点兼而有之。把光影引入植物

科学绘画，是一大突破，正如曾孝谦在访谈节目里所说：“光是植物的生命，它是一种渴望，没光影，画就没有生命。”

当窥探到一个画者用什么材料、什么纸、什么样的绘画工具以及如何用个人发明的独特技法作画，宛如走进他的私人工作室。自传中提到，曾孝谦早年买不起好颜料，在照相馆看到工作人员把黑白照片染成彩色，用的是一种纸本的12色透明水彩，把色纸撕下来，放在调色碟里，加水后便能溶解，给照片上色。因为价格不贵，他也买来画画，颜色多年后都不变。他也试过用非常规材料，比如油墨。在“5·23”项目期间（1967年5月23日，由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牵头的研制抗疟新药的项目），曾孝谦的画作大部分是在热带雨林中完成的。雨林湿度大，水彩、水粉都不适合，他便将印刷厂车间的油墨分装在小玻璃瓶里，用松节油调和油墨作画。近些年，他混合丙烯、水彩、水粉等多种材料作为颜料创作，也尝试把木刻方法运用到动植物黑白插图上。受到玉雕厂工艺师的启发，他还发明了用电磨器在水彩纸上提白提亮的方法，用来处理植物的毛刺、鸟类的羽毛，效果是意想不到的自然。

除了这些专业内容，令人感动的还有老一辈学人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书中提到真菌专家臧穆与曾孝谦的友谊，臧穆对真菌的偏爱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一旦发现昆明植物园或黑龙潭附近有鲜活的野生蘑菇，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跑来找他，俩人带着绘画工具一起去现场写生。“我们之间不唯有师徒尊严，还有朋友情谊，一幅幅带着环境背景的写生图，就是这份情谊的见证。”

2018年，曾孝谦被诊断为肺癌中期，需要去北京复查。出发前一天，植物所的老同事、著名植物学家李恒来到他家。曾孝谦感觉不寻常，果然，李恒有一篇论文准备投给《自然》(Nature)杂志，缺一幅滇重楼的彩图，希望他到北京后能抽时间画

一下。“我知道《自然》是国际生物学的顶级刊物，此文一定非同一般。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李恒没说些什么，留下必要的资料就放心地走了。”到北京后，往返医院做检查的20多天里，曾孝谦利用检查空隙的所有时间，在入院前两天完成了作品，没有食言。“这就是我们，她若是客套，她就不是李恒，我若是拒绝，我就不是我了。”

2023年初，李恒离世，就在她去世前不久的一天傍晚，曾孝谦在去植物园找漾濞槭（一种极其稀有的无患子科槭属植物）的路上遇见她，俩人打过招呼便分开了。漾濞槭生长在元宝山山顶的一片密林中，晚上没有路灯，李恒怕他找不到，让保姆搀扶着，打着手电筒采集了一枝带着果实的漾濞槭标本，夜里近10时送到他家。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认识半个多世纪，知根知底，直来直去，“越老越知己”。

《自然而然：曾孝谦自传》布面的封面设计质朴，内页用纸也很柔软，很好地展现了曾孝谦画作的色彩和亮度。细细读完，惊叹于他几十年来单凭手中这支画笔，竟完成了这么多精细入微的画作。从早年参与《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到创作《云南百鸟图》和《云南百花园》，再到设计多套邮票并获得国际奖项，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设计所徽等，绘画是他的职业、使命，也是他始终如一的爱好，是他将内心对自然之美的感受传达出来的媒介。

在随书附的一页手记中，曾孝谦的一段话尤其值得回味——“在人生的旅途中，每走一步都并非预先设计好的，要学会珍惜和把握生活中的不期而至，看似偶然的相遇相知，或许会决定你的志向、观念和人生。”如今，曾孝谦在有余力时，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分享绘画心得，指导博物画爱好者、教授青年一代画师。自认一生都在坐“冷板凳”的他，可以说把毕生的热爱，都奉献给了植物科学绘画这项事业。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读孙郁《鲁迅与国学》

罗唯嘉



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个评价突出了鲁迅的革命性，强调他与封建传统的决裂和对新文化的开拓。社会大众熟悉他的小说、散文等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这些成就侧重于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然而，鲁迅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文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对传统文化所下的“暗功夫”上。正如海面上的冰山，露出的部分是鲁迅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和创造，水下的部分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和深刻反思。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撰写的《鲁迅与国学》，集中探讨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关系，从传统文化切入鲁迅思想，别开生面。谈及此书的写作，作者说是缘起于20年前一次关于鲁迅的访谈，主题便是“鲁迅与国学”。那次访谈让他注意到学界大多关注鲁迅的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而少涉及鲁迅的传统文化底蕴。自此，他留意搜集相关资料，系统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成果便是《鲁迅与国学》一书。该书涉及鲁迅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批判转化，对戏曲、野史、魏晋文学、古代小说的研究评价，并围绕“国故”与章太炎、“学衡”派的纠葛，展示了鲁迅知识结构中隐蔽的一面。

鲁迅的文笔犀利、思想敏锐，如锋利的匕首闪着耀眼的白光，背面衬托这白光的底色却大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汲取，远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沉迷与陶醉，而是在新旧时代转换的背景下，以全新视野反思中华古老文明的时代价值。此书首章“从新到旧”，探讨了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旧学”的学思历程。鲁迅早年阅读大量翻译作品，特别是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大大开阔眼界，而留学日本更让他了解到古印度、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明，使其得以从文明比较和演进的角度，思考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以及与各文明相比的异同。

鲁迅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大抵是站在反正统的立场上。书中讨论鲁迅“非儒与非孔的理由”，指出鲁迅从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童年记忆出发，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家教育配合封建统治，戕害了好奇心和想象力，遏制了文明的活力。因此，鲁迅转求于与正统有别的“小传统”或民间

资源，如抛弃儒家经学一统的权威，而去寻找庄子个性意识的萌动（“对庄子的另类叙述”章）；有意回避汉赋、唐宋诗文等文学典范，转而考察魏晋时期离经叛道者的文风（“魏晋文脉之考察”章），还为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著史立传（“《中国小说史略》的微言大义”章）；批判“台阁化”旧戏，看重民间剧种中的野趣与活力（“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章）。鲁迅以其极强的现实感和思想穿透力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的丰富面向。

《鲁迅与国学》不仅从思想角度探究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还特别注意到鲁迅从审美角度开拓国故的现代价值。如对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兴趣，润泽了鲁迅的艺术品位，他喜爱秦汉瓦当、画像石、碑刻等，其书法风格无疑受到这些古物影响，而对秦汉艺术的重视，又反映出他力求超越近世文明的软弱和狭窄，重回元气淋漓的上古的雄心。又如鲁迅对佛教、庄子、魏晋文学的欣赏，很大程度上是要寻求固化的文人趣味之外的生命力。面对残酷现实和人生重压时，这种审美趣味也给予鲁迅莫大的精神慰藉和力量。

《鲁迅与国学》以鲁迅晚年对墨子的关注作结，点出他欣赏的是墨子的苦行之思、民本意识，同时还有墨子忘我的牺牲意识，这是鲁迅从古人世界发现到的可为今人所用的思想资源。而墨子的形象也正契合鲁迅的自我想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与国学》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置身于时代的斑驳光影下，立体又厚重的“文化鲁迅”。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以「一生一事」之心绘自然

读《自然而然：曾孝谦自传》

欧阳婷



从左至右依次为曾孝谦所绘珙桐、硬叶兜兰、小熊猫。

畅游金字塔的国度

范天培

定符号不发音，与汉字偏旁类似，在词尾表示单词的种类和性质。与汉字有所区别的是，古埃及语的不同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可以起到表音或表意的不同功用，通常可以表达两到三种意义。

除了象形文字，木乃伊是古埃及文明的又一标志。《金字塔的国度》中提到，最初，古埃及人将逝者埋葬在尼罗河沿岸。河水潮汐涨落，时常导致遗体从沙土中暴露出来。而酷热干燥的高气压下干燥的环境，又使逝者的躯体得以留存。独特的水文与气候环境，在神学与宗教思维的影响下，让古埃及人萌生了保存逝者遗体、以期转世复生的想法。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古埃及文明发展的脚步不断变得精细、完善。最初的木乃伊制作工序较为简略，只是将遗体浸泡树脂后，再裹满亚麻布。

之后，为了防止腐败，古埃及人会通过特定工序，取出遗体内脏，并在腹腔、胸腔填充药物。人们还会为身份尊贵的逝者装饰华贵的首饰，用石膏雕刻面容与器官。通过古埃及壁画可以了解到，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伴随着诸多宗教仪式，人们用尽手段，以期逝者的魂魄得以识别生前肉身，而后复生。

《金字塔的国度》中还提及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古埃及盛产黄金，古巴比伦加喜特国王给阿蒙荷太普三世法老写信索要黄金，并表示若能如数提供，会将女儿嫁给他。这种赤裸裸的态度遭到法老的调侃：“用自己的女儿换黄金，这可真好啊！”然而，根据历史记载，阿蒙荷太普最终还是与这位来自古巴比伦的公主喜结连理，而加喜特国王也很有可能如愿得到了自己渴望的黄金。这个故事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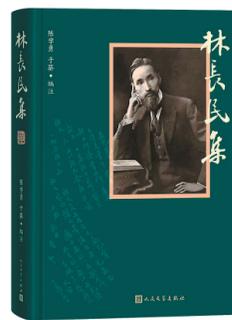
是古埃及同地中海国家、近东国家贸易往来的史实。盛产黄金的古埃及，会向周围国家输出财富，以换取青金石、黄铜等物资。考古显示，古希腊、古罗马出土的一些器物，其纹饰带有明显的古埃及艺术特征，证实了当时古埃及同周边国家存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古埃及文明绚丽如花、醇厚如酒，读者打开这部《金字塔的国度》，一定开卷有益。



近百年来首次结集——

《林长民集》出版



本报（魏小曼）近日，《林长民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林长民研究专家陈学勇与林长民外孙女于葵联手整理编注，是百年来林长民作品的首次结集。

林长民，字宗孟，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力主宪政，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并以一篇《外交警报告国民》的檄文唤醒国民。《林长民集》收录了迄今为止林长民全部可发表的诗、文、日记、书信和翻译文字，这些内容承载20世纪初中国内政与外交的

生动细节，展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历程，折射一百多年前思想文化的风云变幻。

林长民是女儿林徽因一生中最近、对她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20年，林长民赴欧洲考察，携长女徽因同住，这段经历极大地开阔了林徽因的眼界。期间，林徽因结识了威尔斯、哈代、狄更生、曼斯菲尔德等文化名人以及旅居欧洲的徐志摩、张奚若、陈西滢等人，这为她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林长民集》收录的林长民欧游日记，致林徽因、梁思成等人书信，详细记录了林徽因早年的行迹、见闻、交游等生活细节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真实面貌，兼备文学性与思想性，颇具阅读和研究价值。

据了解，此次《林长民集》的出版也弥补了徐志摩生前之憾。1925年林长民离世后，徐志摩曾有意编辑故友遗文《双栖斋文集》，但徐本人不久后罹难。此后近百年时间里，林长民著述无人搜集、整理，直至此次陈学勇与于葵合作，从梁再冰家藏林长民文献中补遗、誊录、考订、编注，前后耗时十余载，出版此书。